



难忘收涓水的父子俩

□吴永丽

这位看上去有四五十岁的伯伯又和往日上午一样,跨越了第一道有40多公分高、约厚10公分的木质门槛,从进入大门到跨越第二道比第一道稍微矮一点、薄一点的门槛后,见到院里的人们时,他的脸上露出了有些谦卑的微笑。他那些有些佝偻、矮小瘦弱的身躯经过小天井的青石板,穿过人字型、有飞檐的木质屋顶的大厅后,就到了大厅至大院屋檐下的中间位置。

这里,放着一个直径50多公分、高约60公分的圆形木桶。木桶被几条楠竹细皮搓成的绳子箍得紧紧的,不会渗水,是院里的人们倾倒剩菜剩饭或者摘菜时丢掉的烂叶、老叶等东西的器皿。

我对这情景的第一清晰印象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那时我只有四岁。

其实,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这盛涓水的木桶中,里面的涓水量是有限的。当然,我们这十家大院里住着的人家,各家经济条件参差不齐,经济条件好的,吃穿用度根本不愁。

所以,这位收涓水的伯伯,每次都会有所获,每次都会将收到的涓水倒入停在大门口街旁的,一个和木质拖车车身长度相等的、扁圆形大木桶内。

这位伯伯不是只收我们院里的涓水,有好多个院里的涓水他都可收,他也周而复始地从事着这繁重的体力活。

他家饲养的猪,也吃着众人家的涓水而一天一天地茁壮长大。

每年过年前的一天,收涓水的伯伯在进门时,总会笑盈盈地提着猪肉,很客气地将事先分割好的每条约有10公分宽、40公分长的猪肉,分发到院里的每户人家,然后,在院里人们的“谢谢”声中离去。

那天晚饭前,院里家家户户都会飘出了煮猪肉而散发出的浓浓香味,弥漫整个院子,也喜悦了院里的每户人家。

几年后的一天,伯伯来收涓水时,身后跟着一个个子高出伯伯一头、身材不胖不瘦的阳光俊郎的青年,伯伯笑着给院里的人们介绍说:“这是我儿子,我年纪大了,以后就由我儿子来收涓水了哈。”父亲介绍完后,那青年便平和地对大家笑着点点头。

时光荏苒,不知不觉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,我再没见过那收涓水的小伙子,后来听母亲说:那小伙子有一天来院里和大家告别过,他一再地谢谢院里的人们。

今年春天前,想着家里以往平台上春天的景象,我兴致勃勃地到住家不远处的一个有机磨磨黄豆、卖豆腐的店,对店里的老板说道:我买点你们的豆腐渣可以吗?那女老板问我买豆腐渣干嘛呢?我告诉她:我们家有个平台,我喜欢在平台上种些花和蔬菜,这豆腐渣放进矿泉水瓶里,加些水沤肥,因为可以拧紧盖子密封,所以,既不会生虫,发酵后,又是很好的有机肥。

那老板听后笑了,然后热情地给我装了一大袋豆腐渣,我连连说:够了够了,然后问老板该付多少钱?老板连连摆手说:不要钱不要钱。

回家的路上,豆腐店老板的笑脸还在我脑海里萦绕,我有幸遇到了一个同样崇尚绿色生活者。

其实,我们家从养花种菜开始,所有的食品垃圾都会被丢在花台的角落处。而不久就会发现,这些食品垃圾经过时间的洗礼已经降解成有机肥料了。

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今天的人们早已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。可我每每想到生态循环,或者在养花蒔草的过程中,那收涓水父子俩的身影总会浮现在脑海里,还有那满院子里飘荡的猪肉香味……

认个爸妈看场电影

□莫小君

小时候,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电影。《三进山城》《地雷战》《地道战》《渡江侦察记》等是我必看的电影,那时票价1角3分,这么便宜的电影我们当时也看不起。可那些电影太吸引我了,怎么办?只有想办法混进电影院去看。

那时,每当晚上6点半左右,我都会和院里的小伙伴去混电影看。我们先观察地形,电影院有三道门,如果是老片,一般只开中间那道门,工作人员一边站一个检票。我们一般会在开始检票头几分钟挤在人群中,才容易混进去,如果没有在头几分钟挤进去,进场的观众一少,工作人员就会发现我们不让进去。我们个子小,站直了脑袋也只在大人的腰部位置,进场时会弯着腰进去。但是,混场的事做多了也容易被发现。

后来,我们牵着大人们的衣角混进去。经过多次实践,还发现有规律可寻。一般不要去找男的,即使装他的儿子,他也不愿意,女的善良些,只要跟她说:“嬢嬢,我想看这个电影,带我进去好吗?”“要得。”大多数女的会答应,于是,进场牵着她的衣角就能被带进去。进去之后自己再找个边边位置坐下看,如果运气好,那晚你会安心地坐在那里把电影看完,运气差一点,会换好多个位置,整个晚上都在提心吊胆地看电影。

有年夏天,我又去看电影《三进山城》。我去

时,已经有点晚了,这时有一对耍朋友的人正要进去,我赶紧跑到女的面前求她带我进去,男女双方为了显示自己有爱心都同意了。我牵着女的衣角往里走时,工作人员把我挡住了,因为我已是他重点注意的对象。女的对工作人员说:“你干嘛拦住我弟弟。”工作人员问女的我姓什么。女的脱口而出:“王”。工作人员是知道我的姓的:有一回下午放学后,又去看电影。我牵着一位叔叔的衣角进场时被工作人员拦住,问叔叔姓什么,叔叔说姓“张”,我也随着说姓“张”,那位工作人员不信,他逮住过我好几回,我姓过“李”“赵”“孙”,这次他一定要查清我到底姓什么,刚好我背着书包,他把我的书包打开,找到作业本,上面有我的名字,知道了我姓“王”。这一次工作人员没有想到女的也姓王,我也没有想到。工作人员没有再核实我们是否是真姐弟,那时还没有身份证。

《渡江侦察记》在我们当地首映时,我求爸爸带我去看这部电影,而爸爸也想看,终于能跟自己的爸爸名正言顺地去电影院了。但在进门时又被拦住了,我早已被那些工作人员记在心里。爸爸不知何故,自己带儿子来看电影会被拦住,说我跟别人当过好几次儿子来看电影。爸爸听工作人员说明原因后,非常生气,回来后狠狠地揍了我一顿。从此以后,我再也不跟着别人当儿子了。

母亲用过的老物件

□王斌

母亲的老物件是小镇生活的见证者,老物件饱含了母亲对我们的爱,也见证了我们成长的足迹。

针线筐

针线筐是用细竹篾编成的。小时候,这只被母亲的双手磨得油光发亮的小竹筐里装着线团、线锭子、各色花布头,还有各种鞋样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家乡的小镇还没有通电,家家户户点着煤油灯。寒冷的冬夜,辛劳的母亲为在乡政府上班的父亲和我们三兄弟缝补衣服。破了洞的衣服铺在母亲的膝盖上,她从针线筐里找出同样花色的小布头,先剪成或方或圆、大小合适的补丁,再飞快地穿针引线,沿着边缘密密地缝补起来。遇到布厚针线穿不过去时,她就会从针线筐里翻出铜顶针戴上,先把针穿过去,再接着缝。漫漫冬夜,昏暗的煤油灯照着母亲,一晃一晃的影子落在我的枕边,伴着我沉沉地睡去。

夏夜,我趴在小方桌上做作业,母亲在一旁做针线活。屋子里静静的,只有我写字的“沙沙”声和母亲抽拉针线的“窸窣”声。

针线筐现在保存在我的书柜里,每次看到针线筐,我就会再次想起在小镇上的那段生活。

红木箱

红木箱是外公留给母亲唯一的嫁妆,母亲一直舍不得丢掉。我一度猜想着红木箱里会藏着什么好东西,竟让母亲如此珍爱。可让我意外的是,箱子打开,里面大多是一些旧玩具:橡皮弹弓、麦杆蟋蟀笼、小人书、木头高脚、玻璃弹珠——这些都是小时候我玩过的,市场上早已见不到它们的影子,可这些我不经意丢掉的玩具,都被母亲一个不落地收藏在了红木箱里。

箱子的一角有包塑料布细细捆扎好的东西,慢慢打开,是很多旧课本,从我上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毕业,分成文理两科两摞整齐地码在箱子里。纸页破旧发黄的课本上,清晰地记录着我从懵懂童年到

稚气少年的成长足迹。

另外,箱子里还有很多小鞋子和旧衣服,用一块红绸布包裹着,放在箱子的下层。小布鞋、小凉鞋、小白网球鞋、小裤子、小褂子……每一样东西的来历,母亲都能如数家珍般一一道来。

母亲的红木箱收藏了我幼年的嬉戏玩劣、欢乐哭笑。同时,还有一样东西伴随红木箱留了下来——那就是母亲对我的爱。

收音机

那台老收音机是上海产的红旗牌收音机,狭长暗红的机身,机身左边并排着两个镶嵌着有机玻璃的大旋钮,一个调频率,一个调音量。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父亲在家乡草坝镇工作时花13块钱从供销社买来的,也是父母结婚以来,父亲送给母亲最值钱的一样东西。为此,母亲对收音机异常爱惜,不仅平时勤于擦拭,还专门扯了一块布搭在收音机上。

老收音机无疑是我们儿时最贵重的电器。它的到来,极大地增加了我们的见识,使我们的视野远远地延伸到了小镇之外,知道在小镇的外面还有一个炫丽多彩的世界。记得上小学的那些日子里,每天下午放学回到家里,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放下书包,搬来小木凳端正正地坐在收音机前,然后眼巴巴地望着墙壁上的挂钟,瞅着指针指到6点钟时,便迫不及待地打开收音机。随着收音机里传出那熟悉的声音“嘀嘀嗒,嘀嘀嗒,小朋友,小喇叭开始广播啦!”我们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欢喜和激动了……

而在中午12点至12点半,又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长篇小说《三国演义》的时间。“千里走单骑”“火烧连营”“虎牢关”“蒋干盗书”“辕门射戟”——这一个个妇孺皆知、脍炙人口的三国故事最初我就是从老收音机里听到的。老收音机,见证了我的懵懂童年少年,也陪伴着我一路成长。

针线筐、红木箱、收音机,母亲的这些老物件,在我心里从未远去……